

对话马克思：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

——读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

刘斐丽

提 要：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经济学》通过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与马克思展开对话，他阐述了一个社会关系决定经济基础的部族社会，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进行质疑；同时深刻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的核心理论一脉相承。文化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实践理性的区别，本质在于，前者关注人而后者关注物，这一区别体现出萨林斯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反思性；同时，强调文化理性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唯物主义 文化理性 实践理性 经济决定论

马歇尔·萨林斯^①（Marshall David Sahlins）的学术思想有很强的阶段性。早期他深受莱斯利·怀特的影响，是新进化论的第二代传人，代表作有《波利尼西亚的社会分层》（1958）、《进化与文化》（1960）、《毛拉：一个斐济岛上的文化与自然》（1962）。1972年，萨林斯的研究思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重新理解文化概念并且深刻反思西方文化，转向象征人类学，撰写《石器时代经济学》一书，此后又出版了《文化与实践理性》（1976）。1980年以后，萨林斯将研究视野转向历史人类学，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著作。

萨林斯的学术思想，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这对于反思和认识现代社会具有现实意义。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萨林斯从生产、分配和交换的角度分析部族社会的经济是如何被文化观念所决定的，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进行对话。虽然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

^① 马歇尔·萨林斯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1930年12月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分别于1951年和1952年获得密歇根大学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5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

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1995：695 - 696），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命题却无法逃脱人们的责难，成为许多学者进行对话的靶子。

经济决定论一般强调实践理性，文化决定论更关注象征理性/意义理性，也称为文化理性。实践理性指文化是从实践活动以及实践活动背后的实用利益中逐渐形成的，而象征理性/意义理性则认为，“人的独特本性在于，他必须生活在物质世界中，生活在他与所有有机体共享的环境中，但却是根据由他自己设定的意义图式来生活的——这是人类独一无二的力量”（萨林斯，2002：2）。“马克思一派的学者认为文化应该是属于部落社会的，但萨林斯否认这种带有强烈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理论假设，坚持认为作为象征性秩序的文化无处不在”（赵旭东，2001），而且强调现代经济理性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它不存在于非西方的原始文明形态中，也不是历史阶段的普遍形态。不仅如此，他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的实践理性与部落社会的文化统一起来，认为资本主义的金钱理性“只是更大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果。无论西方与非西方，理性只是文化的一种表述，它表现为围绕物质使用的意义体系，理性与文化绝不是对立的”（萨林斯，2009：7）。

一、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

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一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影子，又可以看到列维 - 斯特劳斯的影子。实际上，“早期的萨林斯追求的是把美国的人类学拉向右侧，其借助的就是引入一种源自马克思的理论启迪。成熟的萨林斯则试图要利用列维 - 斯特劳斯来修补马克思模式的不足”（赵旭东，2001）。因而，我们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萨林斯对话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两条线索。

他通过研究石器时代的经济，说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适用于解释部落社会，这是本书的一条明线。萨林斯作为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以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关于全部人类的理论，而只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一种特定的理论体系，因而不能用来解释部落社会。“唯物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因此它具有特定的历史地位，它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体系之

灵光一现的自我意识。在这一体系中，人与人的关系，正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被具体化为经济关系。如果将唯物主义毫无变通地运用来理解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话，那么，它会遭遇到一种‘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没有出现的十分根本而又重大的困难’”（萨林斯，2002：19）。

然而，“与其说萨林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是对马克思的诘难，不如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张海成，2015），人们往往关注他用以反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明线，忽略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脉相承的、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的暗线。“人类学的最高目标必定是和批判性的唯物主义相一致的‘帮助人们脱出他们自制的尚未觉悟的经济决定论牢笼’”（萨林斯，2002：2），因而，萨林斯是用部落社会的有限需求、文化逻辑来批判资本主义中的物质利益、工具理性，这样一条线索成为不容忽视的重点。

二、明线：文化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的交锋

萨林斯对经济决定论的质疑，主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质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命题。他认为，石器时代，生产力由亲属关系、政治制度这些生产关系决定；交换价格由社会关系决定。第二，质疑“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市场供求影响商品价格”这一价值规律。他认为，石器时代，商品的交换比率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而使用价值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不是市场供求影响商品价格，而是社会关系影响商品价格。

从生产领域来看，部族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这一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大相径庭。萨林斯通过分析部族社会家户生产模式的特点：劳动力的男女分工、人和工具的原始关系、以生计为目标和低强度的生产，来说明部族社会生产的本质是低度生产，表现为资源低度利用、劳动力低度利用和家户普遍存在短缺。萨林斯认为，一个个家户生产单位以“原子化”的形式无序地散落在土地上，因而，家户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萨林斯指出，部族社会存在调节这种低度生产的社会机制。他通过研究马祖鲁与卡帕库两个社会的恰亚诺夫标准强度曲线的偏离情况，发现亲属制度和政治制度

对生产的影响。亲属关系反对家户间的关系的离心趋势，不仅抵制家户内部的劳动力不足，而且抵制社会集体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不足；政治制度可以遏制家户经济的分裂趋势，激发群体的经济动力。“在部族社会中，不论亲属关系、首领权威还是仪式规则，它们不但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更是决定经济的力量。这些力量依托家庭之上的社会结构，以及生产过程之外的文化结构，控制着社会经济的张弛。这种社会等级制度的最终物质产品，便高于家户模式的产出水平，即使农户在技术上还倾向低度生产”（萨林斯，2009：117）。从分配与交换领域来看，其一，萨林斯通过分析礼物经济来理解部族社会的交换。礼物经济一直是人类学研究原始社会交换的核心关注点。马林诺夫斯基（2009）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里，将特罗布里恩社会的赠礼详细分成七种类型，并提出库拉交换圈理论，他认为“这种循环流通并不是以对功用效应、盈亏账目的简单估计为基础的，而是对一种比纯粹动物性需求更高层次的感情与审美需要的满足”（马林诺夫斯基，2009）。莫斯指出礼物的 hau 使得交换成为责任和义务，“这种礼物交换的经济完全远离了功利主义的自然经济”（莫斯，2014：297），而礼物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在于，作为社会事实的礼物是“完整的”，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即“所有这些现象同时既是司法的、经济的、宗教的，甚至还是审美的、形态学的，等等”（莫斯，2014：306-307）。莫斯提出的礼物交换的互惠性原则也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乔治·巴塔耶“被诅咒的分配”，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以追求荣誉为起点和归宿的；列维-斯特劳斯将互惠性原则运用到亲属关系的研究中；布尔迪厄把“礼物交换模式”应用到对作为分层之根据的“资本”的分析上，受“声誉货币”的启发，把人所拥有的学历、社会关系归结为“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莫斯，2014：2-3）。

在这样的脉络下，萨林斯重新解读莫斯的“礼物”，认为礼物的 hau 的本质是物质生产力，或者利润，礼物不仅需要偿还，还需要有增值的部分。这样，由礼物带来的交换可以视作部族社会的经济理性，这是萨林斯对礼物的发展。不仅如此，在萨林斯看来，礼物更重要的是社会性和政治性功能。礼物的意义不在于组织社会之为团体，而在于联系分散的群体；同时，礼物是部族社会达成和平的方式。战争的威胁带来互惠这一深层需要，可见，礼物是一种理性，是人类的理性对愚蠢战争的胜利，人类运用文化力量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同时，所有的交换，在物质层面上都承担着相互调解的政治重任，经济性的交换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正是本文作者所

要强调的（萨林斯，2009：197 - 198）。

其二，作为交换的互惠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而非生产决定的。萨林斯将互惠分为三种形式：慷慨互惠、等价互惠以及消极互惠。他认为，影响互惠的主要因素有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近亲倾向于慷慨互惠，而陌生人则倾向于消极互惠；社会关系的等级与经济权利相辅相成；慷慨互惠是社会等级的启动机制，慷慨之人的“豪爽大方通常被视作领袖身份的启动机制，因为这为他带来了追随者”（萨林斯，2009：241）。其三，市场和竞争的缺席使得实践理性不能用于解释部落社会。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市场供求影响商品价格。然而，萨林斯通过研究交换比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发现在原始贸易中确实存在供应和需求机制的运行，交换价格反映供求关系，以此驳斥过去认为决定市场价格的供求关系并不存在于部族社会贸易中的观念。在肯定部族社会存在市场的供求关系之后，他进一步分析影响市场价格的因素。他认为在部落社会中，第一，社会关系而非价格将买方与卖方联系在一起；第二，伙伴关系主宰了交换比率，维持了交换价格的稳定；第三，交换比率取决于贸易关系的社会性质，所以它对供应/需求变化的反应程度有所不同。即，贸易体系的可变性取决于贸易关系所处的社会结构：占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决定经济关系的稳定系数，社会关系的亲疏会导致贸易关系的远近。这样，萨林斯最终得出市场价格受到社会关系影响，而不是受到市场供需影响的结论。

三、暗线：批判资本主义社会

在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经济学》中，作者在阐述部族社会的经济特点时，无不暗含着部族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第一，总体而言，部族社会有限需求，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无限满足。部族社会是糊口经济，食物短缺、物质不发达成为部族社会的代名词。然而，他们需求非常有限，可以随时向大自然索取所需食物物品反而成了一种物质丰裕的社会；没有财富观念的他们，不必为不断地积累而困扰，有限的物品便使他们获得满足；他们慷慨至及、及时行乐，只要有食物，便大吃一顿；可以轻易解决温饱的他们，不必在田间地头长时间劳作，可以安享闲暇，随心所欲地安排作息。部族社会在有限需求下可

以保持物质丰富，然而，以实践理性为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却面临着一些无法解决的实际困难。

第二，食物短缺不是狩猎采集的标志，相反，在现代世界里，饥饿却变得司空见惯。“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受环境影响，的确保持在较低的生活水平。但从他们的目标来看，他们掌握丰富的生产手段，可以轻松满足人们所有的物质需要”（萨林斯，2009：45）。然而，“饥饿人口总量相应并绝对地随文化进化而增长”却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克服的悖论，贫穷与进步是不可分离的，这在18世纪便得到经济学家的认同。18世纪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奥特斯·贾马里亚在1774年宣布一个公理：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其人口相对应，而其痛苦程度也与财富相对应。约翰·穆兰法在1782年写道，最大多数的穷人不是出现在贫穷或野蛮的国家，而是出现在最富庶或最先进的国家（波兰尼，2013）。“世界上最原始的人们拥有极少的财产，但他们一点都不贫穷。贫穷不是东西少，也不仅是无法实现目标，首先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贫穷是一种社会地位，它恰是文明的产物”（萨林斯，2009：45）。这里，萨林斯对贫穷的解读可以看出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人类前进的每一个脚步都使他双倍远离自己的目标。”（萨林斯，2009：45）

在部族社会里，有限需求使得人成为人，能够安享闲暇、安享“富足”的物质；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追求财富的无限欲求，使得人类沦为物质的奴隶，贫穷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便体现出萨林斯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第三，部族社会“为使用而生产”（production for use），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交换而生产”（production for exchange）。现代人追求的是交换价值，目的是获利，渴望获取的是普遍的抽象的财富，这样就造成了无限的欲望以及不断增大的生产强度。萨林斯运用两个公式展开论证：公式一——“我们的经济注定与稀缺性相伴”和公式二——“（每人的）工作量随着文化的进化而增加，闲暇的时间减少”，二者体现出现代社会“无理性”的无限欲求所带来的困境。“稀缺性不是技术手段造成的。它是由目标与实现能力间的差距造成的”（萨林斯，2009：6）。任凭技术如何发展终究难填无限的欲壑，加之，市场经济将稀缺性制度化，使得纵使所有人类文化都在追求对物质的解脱，“我们却可耻地沦为物质的奴隶”（萨林斯，2009：34）。相反，“狩猎者的经济方式渲染着原始丰裕的色彩，包含着对丰富自然资源的信念，而不像我们一样积郁着对物质手段不足的伤怀”（萨林斯，2009：34）。

第四，萨林斯通过对比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和莫斯的礼物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部族社会的社会契约形式，在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部族社会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处。他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证：其一，资本主义社会中契约是政治交换形式，而部族社会中交换是政治契约形式；其二，社会契约的结果是国家制度，礼物是联结部族社会的契约；其三，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私人权利的交付是为了保证公共利益，“交付个体权利的所有人都被契约异化，惴惴终日”（萨林斯，2009：197 - 198），而部族社会的礼物不会剥削各自的权利；其四，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恐惧产生服从进而换得和平，而部族社会的群体间因交换而结盟，赠礼的慷慨除了带来荣耀，没有牺牲人们的平等和自由。

第五，部族社会的交换由人群的社会关系和亲属关系决定，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依靠的是价格和金钱。部族社会的交换形式随着社会关系的不同而不同，等价交换一般出现在社会边界区域，即距离亲属关系距离最远的地方，可以说是陌生人范围里。然而，即便在这样的群体外部区域的交换仍然受支配于道德与社会的力量，存在着贸易伙伴关系。在部落社会中，没有人可以为了利益不顾一切，没有人会为了得到陌生人带来的洋货而对自己人不利。相反，在现代社会里，商场如战场，供方和需方围绕着价格展开火拼，二者此消彼长，水火不容。再者，在部落社会里，一个缺乏贸易往来的人，出多少钱都买不到他想要的东西，这就说明没有交换圈子的人再有钱也于事无补；然而，现代社会却是金钱的世界。因而，部族社会的市场贸易将社会、道德与个人都纳入确定价格的考量范围，充满人性；而金钱理性充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却抛开社会、道德与个人，使得人们成为追逐金钱和利益的工具。

四、小 结

虽然萨林斯用文化决定论质疑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但我们更应该看清楚的是，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批判资本主义，进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批判进路：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将矛头直接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无限匮乏；他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来发现经济决定一切，强调实践理性。而萨林斯则立足于原始社会——前资本主义，

发现原始社会优于资本主义之根本——减少需求；他通过分析部族社会的经济来发现文化决定经济，强调文化理性。因而，这样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的发现，不仅使我们看到萨林斯与马克思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萨林斯强调文化理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萨林斯强调文化理性的意义在于，其一，文化理性有助于重视文化的特殊性，打破文化霸权，促进不同文化的共同发展，符合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经济决定论实质是用进化论的思想、用西方社会的眼光来看待和衡量部族社会意义，是西方霸权话语的体现。萨林斯的文化理性强调每个社会都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尊重文化的特殊性。“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甚至有必要囊括适应变异的更多种类，对甲种文化具有选择性优势的，对乙种文化就可能是毁灭性的。同样不能断言，那些被看作一般进化过程中的高级文化，就一定能够比低级的更好地适应其自身环境”（哈定等，1987：22）。因此，西方社会比部族社会没有先进多少，“我们不应使用单一尺度来衡量人类社会，更不应将它们依照发展的程度来分类：因为它们的模式发展分属于不同性质”（列维-斯特劳斯，2016：49），每个社会都有自身的文化理性来支撑它的发展，如果一味地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是行不通的。

罗伯特·路威（1922）在《文明与野蛮》中，通过阐述文明的历史，强调我们要着眼于全人类的贡献，破除“文明人”的自大狂妄。他认为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是各民族相互学习借鉴的结果，西方“文明人”比“野蛮人”并没有先进多少，他要我们摒除种族的和时代的自大心，用远大的眼光来观察人类文明的全史，要我们敬重那些奠定我们的文化的基础的先民（路威，1992：2-4）。

现代西方的实践理性与部族社会的文化理性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将二者的思维分别称作“科学的思维”与“野性的思维”，他认为二者不是“原始”与“现代”或“初级”与“高级”这样的等级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是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的两种互相平等发展、各司不同文化职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的思维方式。土著人的分类法不仅是有条有理的，而且还以精心建立的理论知识为根据（列维-斯特劳斯，2006：44）。

其二，对社会的发现有助于将人从功利主义中解放出来。在部族社会，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或者社会决定经济是萨林斯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使经济学家“原始经济人”的假设站不住脚，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社会。马林诺夫斯基所

发现的“库拉圈”就是对“原始经济人”的批评，这种实用品贸易的经济活动，“虽然伴随着普通的贸易，但其自身绝非是一种单纯的商贸交易；这种循环流通并不是以对功用效应、盈亏账目的简单估计为基础的，而是对一种比纯粹动物性需求更高层次的感情与审美需要的满足”（马林诺夫斯基，2009：3）。同时，构成库拉体系的实用品贸易，其经济上的交换意义完全是居于次要位置的；而库拉有社会意义才是最重要的，它可以将商贸事业、社会组织、神话背景、巫术仪式结合在一起。

马塞尔·莫斯则看到了在部族社会作为交换媒介——礼物的非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即“各个民族正是通过把理性与情感对立起来，用和平的意志来对抗这类意外的疯狂，从而成功地用联合、礼物与贸易代替了战争、隔离与萧条。这就是我们这些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各个社会因为自己、次级团体和个人懂得建立送礼、收礼和还礼的相互关系而不断进步。因此，氏族、部落和各民族知道了——而且将来在我们的文明世界里，各阶级、国家和个人都理应知道——如何相互反对而又不相互屠杀，如何互惠而又不牺牲对方。这就是它们的智慧与团结一致的永久秘密之一”（莫斯，2014：310）。

卡尔·波兰尼（2013）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中发现，经济嵌入社会之中，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是独特的现象，其目的是让社会屈服于市场经济的规律，与资本主义国家以前的经济都臣服于社会相比，完全不同。“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他不会因要取得物质财物以保障个人利益而行动；他的行动是要保障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及社会资产。只有当这些物质财物能为他的目的服务时他才会重视它。”（波兰尼，2013：113）

其三，萨林斯的文化理性是对实践理性的批判，是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反思，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的思想体现出一种人文主义色彩，他看到了部族社会满足人类生存以及发展的经济特点——低度生产的趋势，有限需求及安享闲暇充分阐明，在石器时代，人是生活的目的。他看到了部族社会充满温情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可以给自私的家庭经济施加压力，让优势家庭多生产而去贴补劣势家庭的生计；政治制度，尤其是大人物制度则为了获得荣誉倾向于慷慨，分发他的财富。他看到了个人成为交换贸易中所要考虑的对象，而非物化的供求关系。这种人文主义关怀正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注物的本质的有力武器。

其四，强调文化理性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地方性知识有其存

在的意义，西方的不一定是先进的。面对全球化浪潮，如何保持中国特有的文化理性，而不被全球性的西方的文化所侵蚀，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中积淀下来的，有自身发展的土壤，因而，我们一定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根据自身的文化理性，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构建自身的文化体系。

参考文献：

- 波兰尼，卡尔，2013，《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哈定等，1987，《文化与进化》，韩建军、商戈令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列维-斯特劳斯，克洛德，2006，《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6，《我们都是食人族》，廖惠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路威，罗伯特，1992，《文明与野蛮》，吕叔湘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马林诺夫斯基，布罗尼斯拉夫，2009，《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张云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 毛斯（莫斯），马塞尔，2014，《社会学与人类学》，余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萨林斯，马歇尔，2002，《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9，《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张海成，2015，《马歇尔·萨林斯文化理论研究现状及其意义》，《知与行》第1期。
- 赵旭东，2001，《神话的文化解释及其争论》，《民俗研究》第1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刘海霞

SOCIAL STUDIES FOR MARXISM

The Main Connot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ports *Liu Haifei* 207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dream , Xi Jinping proposes an integration of the individual dream , the dream of sports power and the Chinese dream together , and requires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sports , especially in view of the three big balls. To promote China’s sports undertakings , Xi Jinping further proposes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sports reform and innovation , and special discussion over the reform of a football program. As to the function of sports , Xi Jinping believes that sports can not only enhance people’s physique , but also apply sports wisdom in daily work. It is worthwhile mentioning that Xi Jinping’s sports diplomacy supports China’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Olympic movement , and enhances the strategy for narrow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A Debate with Marx through Interweaving the Explicit and the Implicit Threads: A Review of the *Stone Age Economics* *Liu Feili* 223

Abstract: *Stone Age Economics* by Marshall Sahlins had a debate with Karl Marx through interweaving the explicit and the implicit threads. By elaborating a tribal society in which a social relation determined the economic base , Sahlins challenged Marx’s economic determinism , but continued Marx’s criticism of modern capitalis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al rationality and capitalist rationality are that the former focuses on human nature , whereas the latter concerned the matter , which embodies Sahlins’ reflection on the modern western culture. Meanwhile , the emphasis of cultural rationality is still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significant nowadays.

BOOK REVIEW

Big or Small: How Country Scale Affects Industrial Policies

——A Review Based on Katzenstein’s Works of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and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Yang Zixuan & Liang Bo* 233